

·读书札丛·

长安有无归德坊辨

史 国 强

杨鸿年《隋唐两京城坊里谱》论及“归德坊”时说:“长安、洛阳均有归德坊,因坊名相同,故易致误。录以俟博考。”^①但据《唐两京城坊考》(以下简称《城坊考》)^②,两京坊名相同者有安业、崇业、道德、道政、敦化、归义、通济、延福、修行诸坊,但无归德坊。杨说值得商榷。

杨文所据,主要是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五五“李固言”条下引述的《感定录》(按,杨误,实为《补录纪传》)中的内容,即:“李固言初未第时,过洛。……及在长安,寓归德里。人言圣寿寺中有僧,善术数,乃往诣之。……是岁元和七年……既第,再谒圣寿寺……”《太平广记》所录,本小说家言,不足赖以考证。据《城坊考》,庄严寺“大中六年(852)改圣寿寺”,则元和七年(812)尚无圣寿寺之名,李固言所谒必庄严寺。由此可见,《补录纪传》系后人追叙往事,叙事之准确性并不可靠,李固言是否曾“在长安,寓归德里”亦值得商榷。据《河南志》,归德坊在洛阳定鼎门街东第四街从南第一坊。李固言未第时曾停留洛阳,那么“寓归德里”句或本应在“初未第时,过洛”句后。而抽去此句,“及在长安”句又与下句“人言圣寿寺中有僧”衔接圆通。另据李健超《增订两京城坊考》所附的《唐长安城图》,永阳坊与归义坊毗邻。李固言居长安时,若住归义坊,则其两谒位于永阳坊之庄严寺既可能又便利。故笔者又疑《补录纪传》作者可能误将“归义里”写为“归德里”。因此,杨文“李固言所居乃长安归德坊”,《城坊考》云在洛阳,实误。又圣寿寺乃庄严寺改名,在长安永阳坊,李固言第前第后两次诣谒,更可证固言之归德坊在长安”之论,实属牵强。

其次,杨文还列出一个证据链:一、长安宣阳坊奉慈寺本开元中虢国夫人杨氏宅,《明皇杂录》则谓其本韦嗣立旧宅,而宋代宋敏求撰写的《长安志》又说其地本马周宅。二、张说《中书令追遥公墓志铭》云韦嗣立卒于洛阳归德坊私宅。三、《城坊考》在洛阳归德坊卢言宅下注云,系马周旧宅。将三者互参,杨文谓“提及洛阳归德坊,辄涉长安宣阳坊,因疑宣阳坊亦名归德坊。”此论漏洞太多。其一,《明皇杂录》仅可说明长安宣阳坊有韦嗣立宅,而无补于长安有归德坊的论证。甚至就宣阳坊有韦嗣立宅,宋敏求也在给该坊加的按语中提出质疑“嗣立宅在归德坊(按,此指洛阳),与上文不同”,并断言长安“诸坊无名归德者”。杨文将宋敏求的按误解为《明皇杂录》的内容,谓“《明皇杂录》关于韦宅记载,言之凿凿,(疑此处杨文脱“不”字)宜轻易否定”。如此将长安宣阳坊与洛阳归德坊混在一起,得出长安与洛阳均有归德坊的错误结论就难免了。其二,据《两唐书》,马周生卒年为601—648年,韦嗣立为654—719年,虢国夫人册封于天宝七载(748)。则宣阳坊马周旧宅为韦氏所据,再为势炽的杨氏夺取,都属可能。而《城坊考》在洛阳归德坊卢言宅下引《两京新记》“云是马周旧宅”,也是可能的,正如杨文所说:“其时权贵两京有第者甚夥。”想必睿宗朝官拜中书令的韦嗣立亦不例外。因此,洛阳归德坊与长安宣阳坊本各有所在,互不牵涉,十分清楚,而杨文论断“因疑宣阳坊亦名归德坊”太过牵强。

总之,长安归德坊的记载是一条并不可靠的笔记小说类的孤证,根据两京城坊里的记载情况,笔者认为长安无归德坊,归德坊仅洛阳有。

作者单位: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

①杨鸿年:《隋唐两京城坊里谱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445页。

②(清)徐松撰,张穆校补、方严点校:《唐两京城坊考》,中华书局,1985年。